

CISHU YANJIU

1 9 8 3

6

辞书研究

-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辞书编印概况和几点意见
编纂《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的几个问题
《藏汉大辞典》的任务和历程
- 汉语词汇形、音、义综合研究与辞书编纂
论词汇语词与辞典语词
计算机和辞书编纂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编纂
珍贵的《古今图书集成》
评《英国文学指南》

辞书研究

1983年 第六期

(总第二十二期)

1	辞书编纂者的责任(短论)	
· 少数民族语文辞书专辑① ·		
2	魏治臻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辞书编印概况和几点意见
6	徐桂珍	编纂《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的几个问题
16	高炳辰	《藏汉大辞典》的任务和历程
25	史铸美	我国突厥语辞书的编纂
32	傅庭训	汉维成语词典中的翻译问题
38	史金波	西夏文辞书及其特点和历史价值
· 我和词典 ·		
54	吴泽炎	我和词典
57	杜哲	对专科词典的希望
59	杨承丕	由《藏汉大辞典》谈及其他
63	黄建华	词典论(六)
73	耿立大	计算机和辞书编纂
83	宋永培等	汉语词汇形、音、义综合研究与辞书编纂
91	华天	论词汇语词与辞典语词
98	符淮青	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 ——兼论与同音词的区别
106	唐超群	现代汉语词典义项序列与“基本义”

· 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讨论 ·

113	卢润祥	辞书选题与中国化的实践
116	罗 禹	专科词典释义中国化小议
122	祝注先	“中国化”问题浅见

· 杂 谈 ·

124	陈增杰	《文选》注标引小议
125	张宗华	“标注语”要规范化
127	李炳泽	苗汉词典同形词条按声调次序排列为好
128	陈元胜	谈谈汉语“合音词”释义

130	俞克忠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编纂
136	田志祥	我们怎样编纂《常用符号小辞典》
142	裘克安	《韦氏大学词典》最新版读后
145	李育中	评《英国文学指南》

· 古辞书 ·

148	袁 逸	珍贵的《古今图书集成》
152	殷正林	李登《声类》性质管窥

· 人物志 ·

161	方 任	《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陈梦雷
163	郭定泰	词典编纂家马卡洛夫

· 释义探讨 ·

167	袁成业	榴霰弹、霰弹、子母弹、群子弹是同一种炮弹吗
173	仲 扬	话说cousin

· 资 料 ·

49	秦 至	建国以来出版的少数民族语文辞书一览
175	李 鉴	1982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续一)
181		《辞书研究》1983年篇目索引

辞书架 补白 读者·作者·编者

辞书研究 双月刊

第六期

1983年11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29号

定价 0.50元

辞书编纂者的责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

出版物中的辞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的总汇、现代文明的标志。辞书的编纂出版，在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建设中，居有重要的地位。

前些时，文化部提出的《关于制订1983—1990年图书出版规划的意见》中关于百科全书和辞书的出版，有：1、《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各类专业百科全书；2、《当代中国》大型丛书；3、《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辞典》；4、《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及各类中外语文工具书；5、各类专业辞书及专业年鉴。同时，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还要出版各个学科、各个产业部门的专业辞书、工具书，包括中外文对照的专业工具书、各种技术手册等。

这是一个规模宏伟的辞书大厦的建设蓝图。实现这个宏伟的规划，辞书编纂工作是中心环节，辞书编纂工作者责任重大，我们应该具有强烈的事业责任感！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生气勃勃，编纂出版的辞书绝大多数是严肃认真、深得广大读者欢迎的。但也有很少数的辞书、工具书，文字粗糙，错漏不少，引用资料不够严肃，装帧马虎，乃至东拼西凑而成者。这样的辞书，既浪费人力物力，更贻误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关系非浅！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加强图书评论工作，要在全国办好几种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图书评论杂志。我们举双手赞成。我们愿意大力展开辞书评论工作，把这也视为对于诚恳负责的编写者的表扬和改变马虎从事编写的现象的促进。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辞书 编印概况和几点意见

魏 治 臻

少数民族语文辞书，包括民族语言单语辞书、双语和多语对照辞书，都是重要的工具书。在我国，这类辞书的编纂和流传，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十一世纪后半叶我国维吾尔族语言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カリ编纂的《突厥语辞典》；十一至十三世纪，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政权所创制和使用的古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编纂的《文海》(1124—1131)、《音同》(1132)和骨勒茂才编纂的《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分别为单语详解辞典、同音辞典和西夏文汉文双语对照辞典)；宋代孙穆编辑的朝鲜语汉语对照词汇《鸡林事类》；元人编纂的蒙汉对照《蒙古译语》；明代蒙古族火原洁奉敕编修的蒙汉对译《华夷译语》；嘉靖十五年(1536)藏族觉顿·仁钦扎西编纂的藏文古今语对照古藏文辞书《丁香帐》，以及女真文汉文对译的《女真译语》等；降及清代，仅乾隆年间就有满、蒙、汉对照《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蒙、藏、维、汉五体对照《御制五体清文鉴》，乾隆二十八年(1763)傅恒等奉敕编纂成书，以满、汉、蒙、藏、托忒、维吾尔六种文字对照的《西域同文志》等巨著；民国年间

青海藏文研究社曾编印《新编藏汉小辞典》(1933),李霖灿、张琨和纳西族和才合编纳西族古文字、汉文对照《么西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1934),此外还有丁文江编纂略具辞书作用的彝族古文字、汉文对译《彝文丛刻》等等。这些著作不仅是我国民族语言文化方面的宝贵遗产,而且也是我国民族语文辞书中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珍贵典籍。

但是,解放以前我国编纂出版的民族语文辞书,品种很少,数量不多,仅限于蒙、藏、满、维、朝、纳西等少数民族语文。自1949年10月以来,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有关法令的指引下,在民族语文辞书的编辑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中央、民族地区和有关地方建立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机构,筹建民族出版社和印刷厂等,开展了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教学和民族语文的学术讨论,出版了民族语文专业的各种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其他科研成果,民族语文辞典、词汇或手册也一部一部地编著和出版了。据了解,几乎所有教学中的民族语言都有其规模不等、形式和规格多样的民族语文词汇和词典。

仅据笔者初步调查、了解所及,新中国建国以来先后编印的民族语文辞书约有一百二十种,成绩是很大的。其中绝大部分质量较高,有些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如《维汉俄辞典》、《汉蒙辞典》、《汉维辞典》、《藏汉大辞典》、《藏汉词典》、《朝汉词典》、《纳西象形文字谱》、《(格西曲扎)藏文辞典》、《蒙汉词典》、《汉哈词典》、《汉景词典》等等。这些辞书尽管其语种、类型和对象各不相同,而且各有其优点或某些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它们的编纂出版体现了我国民族语言平等的政策及其现实,扩大了辞书品种,填补了许多重要门类的空白,积累了少数民族辞书编纂的许多宝贵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辞书事业,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石，而语言平等则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说过：“谁不承认和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页）。我国宪法坚定地贯彻了这一原则。1982年12月修改通过的第四部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55个少数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解放之际21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中除回族、满族和部分畚族通用汉语文以外，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锡伯、傣、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俄罗斯等11个民族有通用的文字；彝、纳西、苗、景颇、傈僳、拉祜、佤等7个民族虽有文字，但不通用。其他30多个民族没有文字，如独龙族和僜人的刻木结绳记事，以及普米族的刻划符号等均属原始标记符号，尚未发展到象形表意文字的阶段。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记录和传播着本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智慧。而少数民族辞书在促进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上，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不仅先后创制了壮、布依、苗、侗、哈尼、黎、彝、傈僳、佤、纳西等10个民族文字，而且先后编印了满、蒙古、托忒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傣、景颇、傈僳、哈尼、佤、纳西、苗、布依、侗、彝等18个语种的近120种辞书。预计1985年前后，还将陆续编印四、五十部包括20多种民族语文的方言词汇字典、民族语汉语或汉语民族语对照辞典、谚语辞典等，如：《满汉词典》、《蒙古语解释词典》、《藏汉口语词典（拉萨话）》、《汉朝辞典》、《朝鲜语常用词汇》、《朝、汉、拉丁文对照动植物名称》、以及《傈僳一汉》、《景颇一汉》、《傣（德宏）一汉》、《傣（西双版纳）一汉》、《黎一汉》、《汉一黎》、《汉一白》、《哈尼一汉》、《锡伯一汉》、《汉一锡伯》、《达斡尔一汉》、《汉一达斡尔》……等双语对照辞典。

然而,如果我们从实际需要来考察,从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水平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在民族辞书的编纂与出版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是:少数民族辞书的品种还不丰富(民族单语词典少,综合性专科词典少,民族语与外语对照词典少,中型、大型辞书少),某些门类还存在空白;少数民族辞书编纂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有待开展;国内外已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充分利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在这方面的人力、智力优势,目前基本上是各搞各的,缺乏统一的领导、规划或交流;技术上也存在不少困难。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的。

下面,提出几点个人的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政策。增加民族语辞书品种,填补空白点,对有民族文字而迄今尚未编印过辞书的,应及早编出,以适应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如:新疆人民需要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原用哈萨克文《哈一汉》、《汉一哈》双语对照辞典,则可编印以供需用。

第二、进一步总结推广民族语辞书编译出版方面的科学理论、方法和工作经验,讲究科学管理和经济效益,缩短出版周期,以利于保证和提高新出辞书的水平、质量和效用。

第三、充分发挥人力和智力优势。我国现有17家民族出版社和几家辞书出版社,拥有一千几百名编译编审专业人员,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加上从事民族文化与语言工作的,这支力量就更大了。应该采取措施,使这支力量能得到充分发挥,争取做到每年每家出版民族语文辞书一、两种,以满足客观需要。

第四、在民族语言教学和科研中进一步重视并充实辞书编纂法、词典学的内容和课题;召开以民族语文辞书为中心内容的经验交流和学术讨论会;召开民族语文出版界的会议,重点研究解决民族语辞书编印出版方面的问题,并对优秀的民族语辞书及其编者、编著者、编辑者、出版者加以奖励和表彰。

(下转第15页)

编纂《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的几个问题

徐桂珍

景颇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一个少数民族。景颇文是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景颇文的使用已有百余年历史。随着景颇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日益发展,为进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语文工作的发展,编纂出版《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两部双语词典的任务便也提出了。1981年,我们编成并出版了《汉景词典》,随即编纂《景汉词典》,并将于1983年年内出版。这两部词典都是八十万字左右的中型双语词典。

在编纂这两部词典之前,我们曾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先出版简明小型的词典,还是出版收词较多的中型词典?

在出版了《汉景》双语词典后,还需不需要再出版《景汉》双语词典?回答是要从实际出发。景颇文是历史较长(与新创文字相比而言)的文字,推行较久。景颇族已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具有一定汉语文水平的景颇族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这批具有景汉两种文字能力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收词比较丰富的景汉双语对译词典。景颇族又是一个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等国都有人口分布的民族。缅甸的《景英》双语词典和《景英缅》三语中型词典已于前些年相继出版。我国应该先出中型双语词典以迎头赶上国际水平。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决定先出版中型双语词典。

我们认为,出版了《汉景词典》之后还需要再编出《景汉词典》。这因为,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都不能等同地为操两种语言的读者服务得一样好。每一部词典都有其主要的作用和对象。在词典中,无论是选词、释义、注音、编排,景颇语和汉语不是处于同等地位,所以仅用一部双语词典很难揭示两种不同语言的体系及其各自的规律。《汉景》是从汉语体系中进行选词,用景颇语进行对译,服务对象是景颇族或懂景颇语文的其他民族;《景汉词典》是以景颇语词汇体系进行选词,用汉语对译,服务对象是汉族或懂汉语文的景颇族及其他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标志。《汉景》选收的是反映汉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词汇,而《景汉》则正好相反。由于汉族和景颇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以词汇系统和范围也不相同,两部词典的原语和译语^①都不同。因而一本双语词典不能同样地为操这两种语言的读者服务。为此我们在出版了《汉景词典》后,紧接着又编纂了《景汉词典》。

一、选词

词典根据编纂宗旨和目的决定选词范围。《景汉词典》是一本旨在为景颇语正音正形的规范化的综合性中型词典,又是一本供景颇人学习汉语和从事汉语翻译与教学之用的工具书。这就决定了这本词典收集的景颇语词应该比较齐全(共收词目一万四千条左右)。

景颇语辞书在国内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景颇语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在解放前一直是个空白。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民族语文工作,培养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词典编纂者自解放初期起几十年来,深入景颇族地区,调查收集了大量词汇,有口头的也有书面

^① 原语是指《汉景词典》中的汉语,《景汉词典》中的景颇语;译语是指《汉景词典》中的景颇语和《景汉词典》中的汉语。

的。词目是在这大量的词汇中筛选的。选词范围是：(一)日常生产、生活用语；(二)地名(包括洲名，海洋名，与景颇族有联系的江河名)及人名(包括本族历史中的领袖名)；(三)宗教和文学用语；(四)重大历史事件名；(五)在群众中已生根或生命力较强的新词语；(六)多数景颇地区已使用并已扎根的借词(包括邻国或他族的)；(七)景颇语中表示特殊语法范畴和上述范围中包括不进去的词类以及音、形有所变异了的词等等。

日常生产、生活用语中有天文气象、时间节令、宗教活动、风俗习惯、度量衡、服饰、亲属称谓、饮食嗜好等方面。这部分词汇占总词汇的90%以上。

同别的民族语言一样，景颇语有自己独特的词汇系统。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而人们的思想是受人们的社会存在制约的。各民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各自构成了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特定的心理素质。作为人们沟通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的语言，反映了本民族特定的经济状态和心理素质，从而构成了各民族特定的词汇系统和词汇结构。

景颇族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是青藏高原南迁民族，绝大多数居住山区，是个山区民族。景颇山区到处是密茂的树林、竹林和各种野生植物，原始森林中的动物也很多。民族的自然环境，必然要反映到民族的语言中来。景颇语中反映这方面的词汇十分丰富。单是从词典中“T”部到“Z”部七个字母的一千五百多个词统计，动植物名和与动植物紧密联系的词就有三百二十个，占这几个字母词数的五分之一强。比如景颇族地区竹木品种繁多，使用范围很广，从房子到生活用具，几乎全是用竹子做成，包括桌子、凳子、架子、柜子、碗、水桶等等。单是竹筒，就有二十多种名称，有打水的，有装酒的，有量火药的，有纺线时放棉花的，有临时当碗用的(斜口竹筒)等等。这些词都不是象汉语那样用复合词的形式表示，而是用单纯词表示。这说明

在景颇族概念中,几种竹筒是各不相同的容器,而不只是形式不同的竹器。此外,由于野生动植物丰富,景颇族采集和狩猎业比较发达。单以打猎方式而言,有设陷阱、扣扣子、扞竹签、夹铁火用枪、射击等十几种。反映这方面的词汇有三四百个。又如,景颇族种植的蔬菜品种很少,多以野菜为菜,野菜种类有四五百种之多,野菜的名词也就很多。

景颇族聚居区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年平均温度在 18°C — 24°C 之间。每年6月至10月是雨季,年降雨量为一千五百毫米;每年11月至来年5月为干季,很少降雨。这样就决定了景颇语中只有“干季”和“雨季”的词汇,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由于景颇地区与别的地区季节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因此在农作物品种、栽种方法、管理方法和生产工具的使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景颇地区水田施肥主要靠雨季冲积成的腐植物和各种绿肥为主要肥料,词汇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概念。

景颇族地区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单独形成独立的行业,而只是在家庭中进行。景颇妇女身穿的彩色多图案羊毛裙子、腿套、多图案护腿,使用的彩色多图案挂包等都是自织的。这些图案种类很多(约有五十多种)。这种家庭织品的词汇相当丰富,约有三四百个。这部分词在景颇族中只是常用词汇,而不是专业用词。

从以上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语言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紧密相连。因此《景汉》的选词就要从原语的客观语言事实出发进行选收,不能用别的民族语言事实和概念去死套景颇语的词汇系统。

除了日常生产、生活用语外,还有表示景颇语的特殊语法功能的词汇和特殊语音现象的词汇,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类。比如景颇语的语尾助词特别丰富,有表示人称、数、时间、句型、语气等语法范畴的。这些语法范畴都是由词汇形式表示出来的。这部分词有

二百个左右。比如lit ni [lit₃₁ni₅₁]这一词具有四种语法范畴。第一种是表示疑问句型；第二种是表示主语是第二人称；第三种是表示主语是单数；第四种是表示存在式。诸如此类的语尾助词全部收入。此外，景颇语中单音节名词重复音节变动词、多音节名词重复后一音节变动词以及景颇语有部分动词加[*a₁*]或[*ʔa₁*]由自动变使动的词（因为动词加[*a₁*]或[*ʔa₁*]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使动概念。这[*a₁*]或[*ʔa₁*]不能单独存在）、副词、语气词等都收入词典。

《景汉》除收现代语外，还选收少量古语；除主要选收口语外，还兼收了若干书面语；除主要选收词外，还兼收了一部分词组。这样做是考虑到力求使这部词典在收词齐全的同时具有显著的景颇族语言特点，能反映出景颇语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

《汉景词典》的选词与《景汉词典》就截然不同了。《汉景》提供的主要是汉语信息，是供景颇族人民翻译、教学、研究汉语的工具书，因此完全按汉语体系选词。《汉景》选词二万条左右。选词过程中曾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成语词典》和《汉维词典》，并特别注意了《现汉》漏选掉的常用词以及边疆常用的汉语口语词汇；不收《现汉》中不常用的或专业性较强的词；补充了若干《现汉》中未收的常用词汇（包括成语和边疆常用汉语语词）。《汉景》的选词集中了几本词典的优点，把一般常用的生产和生活用词尽可能收入进去，但由于篇幅关系，个别常用语词仍难免漏选，有待今后再版时补充。

二、词义分析，词目和义项的确定

词目选定后是确定词目和义项的问题，而这必须在对词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在分析词义上，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以双语词典中的原语的概念分析词义，一种是以译语的概念分析词义。《汉景》和《景汉》都以后者作为依据。理由是：双语词典的原语是由对译语

揭示其语言全貌，而且主要供操对译语的民族使用。所以《景汉》和《汉景》是用对译语的概念来分析词义、确定词目和义项的。

分析词义，要确定哪些是单义词和同义词、哪些是多义词和同音词。在分清这些界限以后才能确立词目和义项。

单义词比较容易识别和确定。比如《景汉》中的“ja[tʃa₃₁]金子”、“shat[at₃₁]饭”等；《汉景》中的“村”、“舌”等词，每个词只有一个意思，是单义词，每个词确立一个词目。

同义词是具有二个以上意义相似或相等的词。比如《景汉》中景颇语“akyang”一词在汉语中含有“脾气”、“态度”二个意义；《汉景》中“嗤笑”一词到景颇语中有“mani agoi”和“mani masit”两个相似的意义。这样的同义词列在一个词目下注上两个词义，不分义项。

多义词就比较复杂。这类词在对译语中具有不同概念的不同词义，在句子里具有不同功能，但在词义中有一个中心意义或同一个动作维系着。判断多义词，就须抓住这个中心义。

先以概念来分析。如景颇语“gamoi [ka, moi₃₃]”一词，在汉语的概念中是“姑妈”和“婆婆”的意思。“Iabu [Ia, pu₃₁]”一词在汉语中是“裤子”和“裙子”的意思。这“姑妈”和“婆婆”、“裤子”和“裙子”是多义词，分别列入一个词目中的不同义项下。又如汉语“叫”一词，在景颇语中有二十个分别表示不同意义的对应词。人叫的叫用“maron”，小孩叫用“kyek”，叫人的叫用“shaga”，母鸡叫用“gatek”，蝈蝈叫用“krik”，公鸡叫用“goi”，狗叫用“wau”，羊叫用“npye”，黄牛叫用“npo”，水牛叫用“nyot”，“这叫什么”的叫用“nga”，老虎叫用“shabam”，猫叫用“nyau”，鹿子叫用“grut”，象叫用“hong”，小鸡叫用“chyayap”，猪叫用“ngut”，乌鸦叫用“kak”，马鹿叫用“kang”，野猫叫用“gri”。景颇语用二十个不同概念的词来分别表示汉语中“叫”这一个词，在对译“叫”这一词时，就须分列二十个义项。

再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分析。在句子中具有多种功能的词

是多义词。《景汉》中 ka 一词,它与“画”一词结合,具有“画”的意思,与“雕”一词结合,具有“刻”的意思,与“字”一词结合,具有“写”的意思。这是与三种不同的句子成分结合中产生的三种不同意义。这类词根据其在句子中的不同功能,确定为多义词,收在一个词目的不同义项下。

除上述概念和功能分析外,还有一种是在上述办法无法使用时用的方法。这方法就是看这个词的二个以上的词义中是否有一个中心意义或同一个动作在维系着。《景汉》中 ja[ʧa₃₁]一词,具有“金子”、“官家女子名字前表尊贵”、“贵重礼物”和“聘礼”四个词义。后三个意思中都是把金子借喻、引申、转移为贵重的意思,因此,“金子”显然是起着维系作用的中心词,也就成为多义词。又如《汉景》中汉语“洗”一词到景颇语中也有各种区别:洗碗的“洗”用“gashin”,洗脸的“洗”用“myit”,洗头的“洗”用“bungkhkrut”,洗衣的“洗”用“hkrut”。这四个词义是由用水把某一件东西由脏变成干净这一个动作在维系着,也就可以确定汉语“洗”一词到景颇语里是个多义词,须要分列不同义项。

除上述单义词、同义词、多义词外,还有一类同音词也是确定词目、义项时需要处理的。同音词是语音相同意义间毫无关系的词。《景汉》中的景颇语 ja[ʧa₃₁]一词,有“接”、“硬”、“爱(哭或笑)”三个意思。它们分属于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是三个在意义上毫无关联的同声、同韵、同调的同音词,这种同音词分立不同的词目。如《汉景》中的“斗”、“豆”、“逗”、“痘”都是同音词,就分立四个词目。

在分析词义基础上确定的词目和义项,脉络清楚,符合双语词典原语和译语的语言事实。

三、词义的对译、注释和描述

《景汉》中的释义是通过汉语来揭示景颇语的词义,《汉景》

中的释义是通过景颇语来揭示汉语的词义。由于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和结构不同,因此常产生缺乏对应词的情形。有些词在词义的某一部分相同或相交,而在另一部分不相同或不相交。在此情况下,对译的办法用不上,就需要采用注释和描述等多种方法加以解决。

(一) 同义对译。这是最简明的一种译法。但由于词汇系统不同,在《景汉》和《汉景》中同义对译所占比重不大。

在对译中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单纯词的对译,这比较容易。一种是双音合成词间的对译,就比较复杂。例如景颇语“mi wa mung [mi₃₁ ua₃₁ muŋ₃₃]”一词对译是“中国”的意思。《汉景》中汉语“中国”一词对译为“mi wa mung [mi₃₁ ua₃₁ muŋ₃₃]”一词。照理说对译得很确切,但是有人提出“mi wa mung [mi₃₁ ua₃₁ muŋ₃₃]”是“汉人地方”的意思,不是“中国”的意思,因此,不能对译。其主要原因是死抠其原始意义和不懂语言的性质和特点所致。

语言是历史的产物,但它归根到底是为表达当今人们的概念服务的。“mi wa mung [mi₃₁ ua₃₁ muŋ₃₃]”一词是由原始意义“汉人”或“祖先”“mi wa [mi₃₁ ua₃₁]”音节和原始意义“地方”,“mung [muŋ₃₃]”音节组成的双音合成组。这个词已完全脱离了原始意义而演变成今天“中国”的特指概念。这也可以从别的语言演变中得到证实。诸如汉语中的“领袖”一词,已脱离了原来“领子”和“袖子”的意思;英语中“chairman”一词,已没有原来“坐椅人”的意思;傈僳语的“飞机”一词,已脱离了原始意义“飞房子”的意思;在佤语中“飞机”一词,已脱离了“飞船”和“翅膀船”的原始意思。总之,对词义的理解,要以操该语言的群众头脑中的概念为准,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既不能凭空编造,也不能任意解说。上述双音合成词完全可以采取对译的办法加以解决。

(二) 近义对译。在两种语言中没有完全相同的或范围一致的